

## 问道学林

##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士大夫精神

——专访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彭林

■本报记者 王霞 张树军

在中国历史中，士大夫是社会的精英人群，他们主导了中国社会的价值观、主流文化和主流思想，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极为深远。士大夫精神是中国古代读书人，在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人生之路上，长期涵养而成的高贵品质。什么样的人叫士大夫？士大夫精神始于何时？士大夫的基本品格是什么？士大夫精神有哪些历史贡献？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哪些启示？为此，本报记者专访了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彭林。

## 中华文化关注人的修身进德

记者：什么样的人叫士大夫？什么是士大夫精神？

彭林：与世界所有古代国家一样，古代中国分为贵族与平民两大阶层。贵族包括天子、诸侯、大夫、士。大夫有上大夫和下大夫之分，上大夫又叫卿，人们常常以“卿大夫”连称。士是贵族社会中最低的一级，再往下就是平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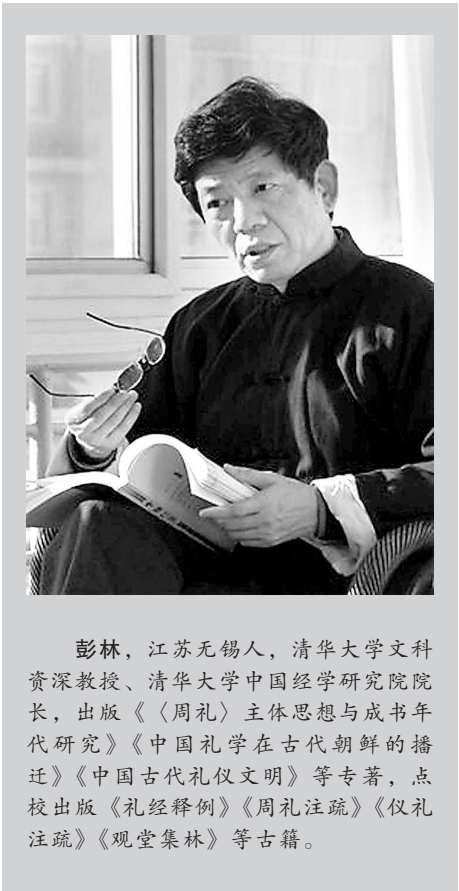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与古印度、古希腊被称为“轴心时代”世界的三大古典文明中心。中华文明的主要特征，是以人作为中心，是将人如何通过修身进德成长为君子，如何从动物学意义上的人成长为道德理性意义上的完人，作为社会发展最核心、最基础的命题，这是中国文化最了不起的地方。士大夫群体之花盛开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上，根本原因就是在这里。

钱穆在《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士》中指出：“中国文化有与并世其他民族其他社会绝对相异的一点，即为中国社会有士之一流品，而其他社会无之。”所谓“流品”，不是指一个阶级或者集团，他们不是集中存在的，而是分散在社会各个层面，无论你是大官、小官，还是普通平民，只要具备了它的条件，就是士大夫。

记者：士大夫精神始于何时？

彭林：早在西周立国之初，中国的人本主义就开始觉醒，这是士大夫精神的发端期。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农业文明时代的地区之一，不仅物质生产发达，还最早提出精神文明应与物质文明同步发展的理念，《周易》中“观乎天文，以察时变。观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”，彰显了上古时代中国的人文觉醒。牧野之战，使周人清楚地看到了殷纣失德亡国的教训，为此，周公“制礼作乐”，进行道德制度的建设，倡导“德治”理念。王国维在《殷周制度论》中指出：“殷周之兴亡，乃有德而无德之兴亡”，乃是“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”，而其谋虑“乃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”。周人将道德建设作为国家机器的主要职能之一，希冀把包括天子、诸侯、卿、大夫、士乃至庶民纳成一个道德之团体，稳步推进整个国家道德建设的水准，达到天下大治。

周公的德治思想影响很大，响应者相当多。春秋时代，列国卿大夫中涌现出很多德



彭林，江苏无锡人，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、清华大学中国经学研究院院长，出版《〈周礼〉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》《中国礼学在古代朝鲜的传播》《中国古代礼仪文明》等专著，点校出版《礼记释例》《周礼注疏》《礼记注疏》《观堂集林》等古籍。

行高尚的贤者，如鲁国的柳下惠、臧文仲，齐国的管仲、晏婴，卫国的蘧伯玉，宋国的孙叔敖、令尹子文，郑国的子产，吴国的季札，秦国的百里奚等，都是非常杰出的代表。孔子最崇拜周公，孔子思想的源头是在周公。孔子晚年著书立说，对尧舜以来的文化进行整理，流传至今的《六经》——即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易》《乐》《春秋》，其中《乐》已失传，所以通常称“五经”——就是经过孔子整理的，堪称是中华典籍文化的源头。孔子创立的儒家，把周公的德治、礼治思想理论化、体系化，把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作为中国的人生取径。修身是立身之本，本立而道生，《大学》说：“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为本。”身修而后家治，才能去治国、平天下。儒家思想的广泛传播，培植了中国社会道德理性文化的深厚沃土，有德之士，代有其人。

战国时期，列国兼并，彼此攻伐，诸侯都意识到人才是克敌制胜的核心要素，所以彼此争夺。有一句成语叫“楚才晋用”，楚国人才虽多，可都被晋国吸过去了。这一时期，在平民阶层中涌现出一大批有学问、有才干的学生，他们打破了往昔“世卿世禄”的世袭制度，成为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新鲜血液。

经过上述几个阶段的发展与融汇，秦汉

以后，人们把一生为社稷江山无私奉献，鞠躬尽瘁、死而后已的知识精英，统称为“士大夫”。

## 士大夫在公言公绝不营私

记者：士大夫的基本品格有哪些？

彭林：历史上“士大夫”很多，如宋代的范仲淹、司马光、文天祥，清初的顾炎武等。他们身上体现的士大夫精神，大致有以下六个方面：

有学识。学问与知识是力量，是软实力。毛泽东说：“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，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。”列宁也说过：“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来丰富自己的头脑，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。”在中国古代，人们同样懂得知识是服务于社会的重要工具。古人定义“士”，不仅仅要有知识，而且要有很强的学习能力，“闻一知十为士”，要能够举一反三，标准很高。古代中国是士、农、工、商四民社会，士不种地、不做工、不经商，是靠学问立足于社会的，所以《汉书》说：“学以居位曰士。”士是靠学问居于官位的。《礼记》说士“夙夜强学以待问”，夙夜强学，是指刻苦学习的态度；待，是等待明君的顾问，而不是用知识换取官爵。真正的士，淡泊名利，清高以待问。

有德行。士大夫不仅有学问，而且立志追求“道”。“志于道者之谓士。”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”德行高尚，是他们的重要特征，所以古人说：“言士者，有德行之称。”“士，有道德之称。”就像今天的社会，不缺有学问的人，而是缺道德、文章都好的人。《礼记》说士“怀忠信以待举，立行以待取”。士所怀抱的不仅是知识，还怀有忠信这样的美德，并且始终在生活中身体力行，他们努力做好自己，等待社会 and 国家的举荐与任用。

有操守。操，是操持；守，是固守。操守，是指有正确的理念与德目，终身执持，牢牢固守之。士大夫有正确的人生追求与价值判断，无论面对何种艰难困苦，都能保持本真。孔子的弟子颜回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，“一簞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”，而他却能“不改其乐”。士能做到孟子所说的“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”，绝不会为了物质利益而变节。

历史上清廉自守的人很多，如王球是东晋宰相王导的曾孙，司徒左长史、丹阳尹王劭之孙，司徒王湛之子，太常王惠的堂兄弟，出身名门望族，家世显赫，但王球没有官宦之家的坏习气，日常生活，“简贵，素不交游”“筵席虚静，门无异客”。当时的尚书仆射殷景仁 and 领军刘湛“并执重权，倾动内外”，王球与他们通家姻戚，但极少与之来往，绝不借用私亲关系牟利。王球负责选举官员，而接客甚稀，凡是为求官者说情的书信一律不看，勤于职守，清廉公正，做到“铨衡有序”，所以“朝野称之”。

## 廉不言贫官之德

■史世海

清贫，我认为你就能建立栾武子那样的德业，所以向你道贺。如果你不去忧虑自己不能立德，而只为财物不足而发愁，我恐怕无喻还来不及，又有什么可以祝贺的呢？”

韩宣子听了叔向的话，下拜叩头说：“感谢您的教导。”

叔向的“人应忧德之不足，不应忧货之不足”，反映了一位贤者的智慧，他的“可贺”与“可忧”，确如孔子所说的，具有古人耿直的遗风。其实，人生在世，应该持守一颗“清风徐来，水波不兴”的平常心，思想上的安贫固穷，德行上的清正如水，操守上的知止有定，任何时候都不能更易。特别是从政之人，既然头戴官帽，就应该知道责任的分量，岂能又想钱鼓腰包。只有清白当官，干净做事，才能真正体现人生的价值。

中国古代历史上，夙夜在公、廉不言贫的清官屡见不鲜：

春秋时的孙叔敖虽贵为楚国令尹，功勋卓著，但一生清廉简朴，多次坚辞楚王赏赐，家无积蓄，临终时连棺槨也没有，他去世后，儿子穷困仍靠打柴度日。

东汉的孔奋清节自守，曾在富裕之县姑臧任职四年，“躬率妻子，同甘菜茹”，财产一点也没有增加，被人讥为“身处脂膏，不能以自润，徒益苦辛耳”。他离任时没有资财，单车上路，被百姓“追送数百里”。

东晋的吴隐之亦身居高位，但所得俸禄

赏赐全都分给亲戚族人，妻子儿女不沾寸禄，家境贫寒如同穷苦百姓。

北朝的袁聿修历北魏、东魏、北齐、北周、隋五个朝代，为官五十多年以清贫为本，连一份薄礼也没有收过，被人们称为“五代清郎”。

明代的海瑞居官刚正，持己清苦，任淳安知县时，穿布袍，吃粗粮，让老仆人种菜自给。海瑞去世时，众人凑钱替他收殓，哭着祭奠的人百里不断。

清代的于成龙身居封疆之位，依然是“布衣蔬食，半茹糠粃”，“日食粗粮一盂，粥糜一匙，佻以青菜，终年不知肉味”，因之被百姓称呼为“于青菜”。

古有名言：“夫人有义者，虽贫能自乐也。”一个人如果能像古代先贤这样将甘守清贫的意识自觉付诸行动，那么物质和精神就在自己的心中实现了协调统一，就能够思想充实和健康，心灵开放而自由，在简朴的生活中获得真切切的幸福感。

要真正做到心如止水，廉不言贫，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既要自己志存高远，立德力行，又与家庭环境、社会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。唐代的崔玄暉能够做到为官清正，就与母亲卢氏的淳淳家教密切相关。据《旧唐书·崔玄暉传》记载，崔玄暉年轻时颇有学问操行，初入仕途时，母亲卢氏曾告诫他：“我听姨兄屯田郎中辛亥驭说：儿子做

不营私。“君子周而不比，小人比而不周。”君子广泛团结大众，不朋比为奸。《荀子·强国》赞美古代士大夫：“出于其门，入于公门；出于公门，归于其家，无有私事也。”士大夫在公言公，在朝言朝，出了家门入公门，出了公门回家门，绝不到处串门，拉关系。小人结党营私，搞人身依附关系。

有抱负。士大夫以身许国，或发誓“不破楼兰终不还”，或豪言“驾长车，踏破贺兰山缺”，立志为天下万民奉献终身，诚如曾子所说：“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远。仁以为己任，不亦重乎？死而后已，不亦远乎？”

有担当。士大夫有抱负，更有担当、敢于牺牲，志士仁人，“无求生以害仁”，舍生取义，决不当叛徒。顾炎武说，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，林则徐说，“壁立千仞，无欲则刚”“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避趋之”等，都是掷地有金石声的豪言壮语。

## 士大夫精神视国家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

记者：对于中华文化而言，士大夫精神有哪些重要的历史贡献？

彭林：首先是树立了中华民族的人格标杆。士大夫修身进德，淡泊名利，清廉自守，一心为公，品行高洁，为中国社会大众树立了高尚的人格标杆，引领社会进步。

“学统”成为国家的稳定器。中华文化是独立形成的文明体系，经过历代知识精英不懈奋斗，不断完善提升，逐步形成了举国认同的“学统”。其后，无论是蒙元、还是满清入主中原，政统易于上，而学统存于下，中国依然是中国，成为维系中华大家庭的稳定器。天下情怀。士大夫精神最突出的亮点，是将国家、民族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位置，每当国难临头之际，他们都前赴后继地流血牺牲，激励万民起而救亡图存。中华民族历尽劫难而始终没有被灭亡，这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。历史上古埃及、古巴比伦、古印度，都曾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，但是由于外敌入侵等原因，他们的固有文化出现了断裂，他们今天的文化是在外来文化基础上重新开始的。只有中国文化始终没有断，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。

文化的传承，具有强大的惯性，时至今日，“士”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，依然有其特殊地位：大学本科毕业获得的学位叫学士，高一层次的学位叫硕士，最高级别的学位叫博士，最高学术称谓院士，都是“士”。但是不少拿了这些学位的年轻人，很少静心想：我除了学习专业，还要追求“道”，内心还要有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理念。范仲淹、司马光、文天祥、顾炎武等传统士大夫，是中华民族脊梁，今天的我们，如何继承他们的伟大胸怀与格局，做无愧于时代的典范，恐怕是每个人都应该扪心自问，认真作答的人生大课题。

## 正气歌

## 一根竹鞭显气节

■蒋江涛

唐武德八年(625年)，唐高祖李渊设壁州，治诺水县，即今四川巴中通江县。壁州盛产一种竹鞭，它生在断裂的岩壁中，历经风吹日晒、冰雪覆盖，弹性好、韧性强，最适合制成鞭子。由于交通不便，壁州鞭的产量又少，故十分名贵。

恰恰就是这样一根竹鞭，引出了两位诗人“以鞭自喻”的精彩对吟。元和五年(810年)正月，御史元稹和宦官刘士元先后投宿华阳县数水驿，刘士元蛮横地占据了元稹的客房，并用马鞭打伤了元稹，此事一时轰动朝野。刘禹锡听说后，寄赠了一只文石枕和一首诗给元稹。元稹回赠了一根壁州鞭和一首答谢诗，刘禹锡再以《酬元九侍御赠壁州鞭长句》一诗赞扬了元稹正直不阿的节操：

碧玉孤根生在林，美人相赠比双金。初开鄂客缄封后，想见巴山冰雪深。多节本怀端直性，露青犹有岁寒心。何时策马同归去，关树扶疏敲磬吟。

首联视元稹为“美人”，这既是对元稹赠诗“野人酬赠壁州鞭”一句中自谦“野人”的回应，也是对其相貌俊逸、才德出众的评价。屈原在《离骚》中常以香草美人比喻忠贞之士，这种隐喻传统也体现在这首诗中。刘禹锡认为元稹虽然处在“巴山冰雪深”这样的逆境，依然保持着傲然挺立、虚心劲节的品格，恰似壁州鞭那“多节本怀端直性，露青犹有岁寒心”的风骨，同时勉励元稹继续锤炼自己的意志，永葆宁折不弯的气节。正是他们共同具有豁达乐观的胸怀与不改志节的操守，两人终其一生保持着挚友的关系。

无独有偶，唐代名相陆贄也曾获赠一根竹鞭，或许也是壁州鞭，但陆贄却拒绝了。唐德宗为此请人告诉陆贄“卿清慎太过”，“如鞭靴之类，受亦无伤”，一鞭一靴这样的小礼物，收下也无伤事体。陆贄不但再次拒绝，并上奏唐德宗道：“临监受赠，盈尺有刑，至于士吏之微，尚当严禁，胡居风化之首，反可通行！贿道一开，展转滋蔓，鞭靴不已，必及金玉。”他认为自己身居相位，一旦贿赂的途径经他之手打通，收受鞭靴的贿赂之风便会愈演愈烈，最终一定会发展到赠金送玉。

陆贄认为自己肩负着引领社会风尚的责任，不仅不能带头收受他人的贿赂，更不能面对行贿受贿的行为视而不见。他之所以拒绝别人赠送的鞭靴等物，就是带头自律，守住“拒贿”防线，防止“鞭靴之类消流不绝”而致“湮没成灾”。他还告诉世人“不受乃其常理”。陆贄正是因此得来后人对他的高度评价。

一根壁州鞭，彰显了一个人的气节与品行，令人读到这两则故事，应有所悟。

## 乡贤故事

## 贤令杨炯

■沈然 张倩

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，有一项名为“杨炯出巡”的民俗活动从唐朝传承至今，已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。每年农历六月初一，村民们从高家镇盈川村杨炯祠出发，抬着杨炯塑像，锣鼓叮咚，走过当地16个村庄28个站点，以祈人寿年丰，国泰民安。2017年，“杨炯出巡”列入浙江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能让乡民们千百年如一日地祭祀，杨炯究竟因何有如此大的魅力？

杨炯是“初唐四杰”之一，自幼聪明好学，十岁应神童试登第，待制弘文馆。武周如意元年(692年)任衢川县(今衢州市衢江区)首任县令，卒于任所，后人称为“杨盈川”。

如意元年秋，已过不惑之年的杨炯奉诏入衢，“选授盈川令”。早有“宁为百夫长，胜作一书生”豪气而一直不得志的杨炯，自然想有一番作为。“受禄宁辞死，扬名不顾身”是他对自己的期许。

盈川设县之初，盗贼猖獗，百姓饱受蹂躏。杨炯认为民受苦的根源在官，到任后，他将“治官”摆到重要位置，《杨侯祠碑》写道杨炯“于吏严酷，容或有之，盖吏多象貌(一种凶恶的兽)，不严则扰民，酷则不敢犯……”施以重典之后，官吏有所收敛，百姓也得以安居乐业。

为官者要看破钱和权谈何容易，但杨炯却能看破二者，提出“以不贪为宝，均珠玉以咳唾；以无事为贵，比游常于粪土”，把不贪的美德当做无价之宝；对于旌旗招展的豪门大户视如粪土。好友宋之问称赞他“惟于坚刚，气陵秋霜，行不苛合，言不苟恣。”

杨炯对属吏严格，对百姓却十分宽和，是位急吏缓民的好官。衢州一到盛夏，酷暑袭人，缺水少雨，盈川也不例外。每年盛夏，杨炯都会冒着酷暑，走遍28个68庄，察看民情农事，了解乡间疾苦。杨炯更针对旱情，带领百姓挖溪建塘，修筑“九龙塘”时，因资金不足，他将自己的俸禄和为人撰写碑文所得的钱都捐献了出来，至今人们还将此塘称为“杨塘”。杨炯在任短短三年，卒于盈川令任上，虽然任官时间不长，但“余韵”却很长。“吾乡人崇祀惟谨，至今弗衰。”一千多年来，每年六月盛夏，盈川村村民都会抬着杨炯塑像，循着他在民间巡访的脚步，探寻着他为百姓谋福祉的踪迹。

百姓心中有杆秤，谁为民众着想、为民办事，谁就能得到百姓的拥护和爱戴。杨炯祠内旧有联云：“当年遣子游盈川，盈川城外五棵青松；世代德贤令，漱水江旁千秋盛。”民国《衢县志》也称：“其祠祀历千载而不衰，具有功德于民不能几也。”奔流不息的时间长河，终将杨炯恪尽职守、爱民清廉的每一刹那冲刷成永恒，铭刻在盈川大地。